

晚年蔡元培

程新国 著

还原被尘封的历史
再现被遗忘的辉煌
告诉您一个完整的蔡先生



上海文化出版社

晚年蔡元培

程新国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年蔡元培 / 程新国著.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80740-640-2

I. ①晚… II. ①程… III. ①蔡元培(1867~1940)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8557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基金会资助出版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王 珺

装帧设计

汤 靖 许 菲

封面题字

赵阳阳

书名

晚年蔡元培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上海市印刷四厂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20

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640-2 / K · 282

定价

35.00元

敬告 如本书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59886521

序

蔡元培毕生倡导“教育救国”与“科学救国”，早年如此，晚年亦如此。然而，人们较多地关注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对其晚年的活动却著述不多，这有碍于对蔡元培思想面貌的整体认识与把握。

其实，蔡元培晚年所遭遇的困厄，有甚于早年。晚清及民国初年的蔡元培，主要是以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启蒙者名世，并能为社会方方面面所接受，而其晚年所面临的，无论是救亡运动、阶级斗争，还是内外战争、政党斗争，都异常激烈而残酷，蔡元培要继续坚持“科学”、“民主”之启蒙，继续推进“教育”、“科学”之救国，其困难之大，不言而喻。

但蔡元培还是朝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和目标前行。在教育上，他提出了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的“三化”方针，恢复重建了因战乱而凋零的全国教育体系，又主持创办了多所著名的大学和艺术专科学校；在科学上，他创立了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的中央研究院，并千方百计地开设了天文、气象、地质、物理、化学、工程、自然博物馆（后为动植物所）、心理、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十个研究所，使中国的科学研究开始走上了体制化、职业化，领衔历时数年的西部科学考察；在文化上，他竭力帮助五四运动的干将陈独秀、胡适、鲁迅、林语堂等人，使新文化运动的薪火续燃，并以文化活动为机缘，推动政治民主和人权保障，最为著名的事例，便是他与宋庆龄等筹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救亡上，他坚决主张抗战，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有这些，使蔡元培的晚年生涯熠熠生辉，光可鉴人。

因此，蔡元培的晚年是值得写一写的。这不光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乎中国近现代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关乎“科教兴国”这一发展战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思想文化构架和社会价值观。

蔡元培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他经历过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等列强的侵华战争；经历过清王朝、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以及国民党统治的时代；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社会变革。在思想领域，面临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的激烈冲突，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摩擦、借鉴和融合。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知识分子要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一贯性并非易事。

正因为如此，《晚年蔡元培》一书的撰写及出版就显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对蔡元培的晚年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叙述与介绍。从书中看，作者参阅了大量的蔡元培的著作、书信、日记及众多当事人的著述，故能言之有据，兼及表里，而且，作者能从深层梳理把握蔡元培与相关历史人物之关系及思想，对一些富有历史意味事件之辨析，有着独到眼光，这也是本书与其他一些有关蔡元培研究书籍的区别之处。

该书虽着笔于蔡元培的晚年生涯，但对其前半生所经历的某些主要事件，亦适时进行穿插、回溯，不仅较完整地再现了蔡元培的人生形象，而且较清晰地展示了蔡元培思想的体系与脉络，这对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借鉴蔡元培的思想及文化遗产很有参考价值。

(蔡建图教授系蔡元培先生的侄曾孙)

2010年岁末于沪上

自序

近代中国，蔡元培先生在教育与科学上的贡献，人所尽知，毋庸赘言。然其身后，所言之蔡先生，多为其前半生，尤集中于改造旧北大、帜科学民主、倡思想自由，及兼容并包、学术独立等，但对其后半生却所言了了。然而，蔡先生的后半生同样精彩。尤其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对中国教育和科学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政治的民主化，也竭诚演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迹。如果说，中年蔡先生，主要还是在教坛布道育人，而晚年之蔡先生，却将教育与科学的发展纳入了举国体制，其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又更胜一筹。

蔡元培晚年之作为，与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特殊地位有关。而这，恰恰是一面双刃剑，是非功过，互相纠缠，以至诸多史家或传记学者为之却步。其实，又何必讳言？

众所周知，蔡先生乃政治上持改良态度的民主主义者，毕生拥护民主共和，反对战争与暴力，呼吁和平与统一，并以“大同”为理想，企求构建一个民主而和谐的社会。这一政治态度，从袁世凯、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执政从没改变。其曾领衔敦促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下野”，而招致国民党的严厉批评。但，这并没影响他在国民党的地位。当国共合作出现危机，蒋介石脱离“左派”营垒，开始“清党”之际，蔡元培虽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四老”相偕予以支持，但他的出发点很明确，只是不赞成苏俄式的“阶级斗争”，以及在中国取缔“有产阶级”，主张通过劳资合作及“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建立“互助合作式”社会主义。所以，他反对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反对实行独裁统治，后不仅与蒋氏疏远，还发起保障民权，并对共产党人加以庇护。更有甚者，还欲与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联合，企图建立一个兼顾各阶级利益的“平民政权”，虽因邓演达被害无果而终，其勇气犹可嘉。

综其一生,蔡先生都是政治上的“调和派”,尤以晚年为甚。当蒋介石拘禁胡汉民造成国民党内部巨大分裂,日寇趁机发动“九一八”事变之际,蔡元培奔走于广州、上海、南京之间,进行“和谈”,实现了和解与统一,促成了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执政的局面。蔡元培的政治声望也达到了最高点(蒋汪都曾有意请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然其依然书生本色。此时的蔡元培,顺势而为,以“国难会议”为依托,呼吁实行“宪政”,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促成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斗争对象,但蔡元培却依然是幸运的,最起码,“五四”前后的“蔡元培”,仍保留着亮色。然而,晚年的“蔡元培”,却被置于彗影之中了。

因此,了解晚年蔡元培,不仅为给出一个完整的“蔡先生”的形象,还在于给出“蔡元培思想”的完整架构,这对于我们处于嬗变中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想象,中国的教育与科学,如果没有“蔡先生”,今天会是什么模样;如果没有“蔡先生”,曾经陷入“文化沙漠”的中国,或许就会失去修复“核心文化”的参照系。

此外,还须指出,大约受制于“晚年”,也影响了“蔡学”(笔者姑且这么说)的研究与继承。近年来,甚至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例如,“蔡元培悖论”,便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其实并无什么“悖论”,即便客观上存在“文化专制”现象,并不能认为社会是在“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却会出现一个相互调试融合的过程。

“唯科学论”是近年指向蔡元培的又一伪说。不错,在今天看来,科学是有局限的,其本身也有待于完善与发展,不能简单地用科学去认识一切、取代一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蔡元培倡导“科学救国”之时,国人尚“不知科学为何物”,中国科学技术又极端低下,急需普及与提高,蔡元培所为恰其时也。而今日却有学者,用前沿科学家在前沿研究中发现的科学“缺陷”,去批评当时的蔡元培不该“唯科学”,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还有,蔡元培的“非宗教”的主张,也值得深入研讨。“非宗教”并非始于蔡元培。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从“非宗教”开始的。而蔡元培对宗教的态度反而温和得多,主张“信教”与“不信教”皆有“自由”。他承认宗教的历史作用,但

同时又认为,“美”和“美育”同样可以唤起人们高尚、纯洁、崇高的感情;同样可以感化和净化人的心灵,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即便如此,现代中国依然充斥着对神灵的崇拜与迷信,蔡元培的主张尚不足以使之改变。与有的学者所论及的中国“宗教文化”的缺失,并扯不上多大关系。蔡元培既倡导科学,又倡导美学,恰恰从人格教育方面弥补了科学教育的某些不足。这些都说明,必须对“蔡先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不然,就无从认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何以有民族文化、民族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繁荣。

“五四”以来的“废孔教”,也使“蔡先生”颇受苛责。蒋介石就为此诋毁“五四”,学术界关于新旧文化的争论也从没有结束。今天,又出现儒学热,对“五四”也有一些新的思考,这都是有益的,但却不能因此否定“五四”,尽管它有很大的缺陷。正因为存在缺陷,更使我们有必要全面了解“蔡先生”,了解他为什么既“废祀孔”又“研究孔”,为什么对学生运动既爱护又矛盾,为什么对“五四”传统既有所批评又坚决维护,这样才能洞见历史的真实。

所有这些,也是促使本人写作本书之初衷。

若从整体上对“蔡先生”有所认识,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可作参照: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扩演近代潮流,输入最新潮流,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时代的大节目。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吧。(《漱溟最近文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先生”应有其完整性,非止于启蒙时代。而了解他何以能开风气、引潮流、划时代,则大有益于构建今日之和谐社会、核心文化和核心价值观。

笔者不才,以上所识,撰为短序,权作本书之开篇。

2010年3月10日于海上

目录

序	蔡建国	1
自序		1
第一章	返沪续新	1
第二章	欧陆问学	19
第三章	沪杭道上	37
第四章	大学院长	58
第五章	金陵梦残	84
第六章	科庐苦筑	106
第七章	“五四”文脉	130
第八章	中间道路	154
第九章	集贤御侮	178
第十章	边陲科考	197
第十一章	保障民权	216
第十二章	鲁林之间	240
第十三章	中美基金	265
第十四章	学术十年	287
第十五章	陕北鸿书	308
第十六章	最后岁月	331

第一章 返沪续新

〔一〕

1923年4月6日晚上，蔡元培在天津码头登上“新铭号”轮船，只身前往上海。蔡元培是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阴历十二月十七日）出生，这时已足55周岁，按照中国人“花甲”之年（60岁）即为老人之说，蔡元培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

4月10日，“新铭号”抵达上海，蔡元培径直前往静安寺西越租界筑路的极司非而路四十号，这儿是张元济的家——一幢落成不久的花园洋房。

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与蔡元培是同乡（蔡是浙江绍兴人）、同庚（皆1868年生）、同年。“同年”，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在科举时代，乡试中举，便是入了“仕林”，举人们要办两件事：一是拜主考官和房官（直接考官），行门生礼；一是会同同年，即所有此科同中之人都要聚会一次，聚会后便设立某某科“同年会”，该会随“同年”们的仕途发展而长久保留。而蔡元培与张元济，又是仕林中罕见的“双同年”，即同是光绪己丑年（1889年）乡试同科举人，又同是壬辰年（1892年）殿试同科进士，交道之深可想而知。

上海，是蔡元培一生的主要依托之地，每次“归来”，总包含着人生的某些重大变故，此番亦然。不过，又站在人生转折关头的蔡元培，这次匆匆只身而来，主要是应张元济的安排，在出国之前抓紧了却个人的婚事。

在婚姻上，蔡元培可谓命运多舛，说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蔡元培少年时读书很用功，17岁时便考中秀才，被本乡富商、藏书家徐树兰看中，请至家中与其子徐维则伴读。由此，结识上虞宿儒王佐及其妹王蕙如。蕙

如识文善诗，与元培知音互许。但王母却嫌蔡家清贫，借口元培“非寿者相”，不去提亲。后却由蔡兄元汾出面聘了元培同窗好友薛朗轩之姨妹王昭。婚后七日，元培应科试，列第一名；秋天往杭州应乡试中举。消息传到王家，老太太非常懊悔，蕙如受此打击，一年后便抑郁而亡。蔡元培每念此女，便心中凄然。王昭虽贤，却有“洁癖”，凡她用的东西，别人（非有洁癖者）去触摸，她会“懊憾欲死”，加之她持家甚俭，因此夫妻间常争执。蔡元培免不了用“夫权”压制她，她也只好忍气吞声。后来，蔡元培宣传自由平等，让妻子“一切申其意”，于是“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①可是，王昭已久郁得肝疾，于1900年阴历五月九日病故。这时，蔡元培已回籍担任中西学堂监督，回想起自己的过失，徒有自责。王昭与蔡元培共同生活了十年，育下两子。长子阿根，早年夭亡。时蔡元培创办爱国学社，急需筹款，阿根病重，蔡仍离沪赴宁借贷，返回时，阿根已气绝，爱国学社学生皆围其痛哭跪地。次子无忌，此时已二度留学法国，在阿尔福兽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无忌曾对人言，父亲说他人不够聪明，所以不要他研究“人学”，要他去研究“兽学”。

王夫人病故后，为“蔡翰林”说媒者纷至。于是，蔡元培将续聘条件书于尺笺，贴在书房，将好事者都吓退了。条件很“怪异”：1. 天足；2. 识字者；3. 男子不得娶妾；4. 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5. 夫死后，妻可以再嫁。^②即便如此，一年之后乡试同年童亦韩仍引来了一位完全符合条件的佳丽。其为江西都昌籍黄尔轩先生次女黄仲玉，字世振，天足，工于书画，天生丽质。元培又在余杭童亦韩友人家亲睹仲玉之画作，叹羨不已，遂喜结良缘。婚后蔡元培便携黄夫人及二子往上海，先代理澄衷学堂监督，后受聘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黄夫人又为元培生下长女威廉（1904年4月20日生于上海），三子柏龄（1906年12月1日生于绍兴）。黄夫人颖慧异常，伴蔡元培由国内到国外，由南京至北京舍弃己业，相夫教子，在流离中厮守了21个春秋。1920年秋，北大首开女禁，招致守旧派攻击，逐走皖系入主北京的直奉联军头领张作霖欲借此向北大发难，李石曾等便运动教育部派蔡元培前往欧美考察教育以暂避。行前，黄夫人已抱病在身，仍坚持送夫远行。然1921年1月9日，蔡元培尚在由法国前往瑞士途中，便在轮船上接到黄仲玉病逝电讯，隔着茫茫海天，蔡元培悲痛欲绝，只能写下一篇祭文痛悼。这篇回肠荡气、催

① 《悼夫人王昭文》，《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277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蔡元培自述》，第3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912年蔡元培与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在一起，中间为女儿威廉、儿子柏龄

人泪下的祭文，后曾被选入民国的国文教材，被无数学子们传诵。

转眼间，黄夫人过世已两年，蔡元培还是孑然一身，亲友们不能不关心。可蔡元培提出的条件却更加“苛刻”：1. 原有相当认识；2. 年龄略大；3. 须熟谙英语而能为工作助手者。以此条件，遍寻京城难有符合上述条件者。这时，又是张元济暗中相助，物色了一个人，此人便是其子张树年的家庭教师周峻。

周峻，字养浩，江苏江宁人，曾毕业于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当然与蔡元培“原有相当认识”；她韶龄33岁，尚待字闺中，当属“年龄稍大者”；她精通英语，足以担当蔡元培的“工作助手”，且又擅长书画，与黄仲玉相当。这一桩天赐良缘，张元济岂能放过？

而且，张元济与蔡元培另一乡试同年徐仲可及其妻，也与周峻熟识。徐仲可，浙江余杭人，曾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为其幕僚，戊戌变法失败后南归，定居上海。蔡元培创办爱国女校时，曾请其妻何墨君女士出任“监学”，周峻是学生中品学兼优者，一向受何监学青睐。因有这层师生关系，张元济正好不必出面，遂请徐仲可、何墨君夫妇作介绍人。据说，周家因双方年龄相差24岁，特地开了家庭会议商量，结果周峻女士自己表示愿意。^①这样，徐、何夫妇方命其子徐新六代笔，函蔡

^① 张树年著《我的父亲张元济》，第19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元培，告之女方情况，并索要蔡的订婚照片一帧。

这时，蔡元培已离开北京暂寓天津，并做着随时带儿女出国的准备。徐家的来信，应该说对他是很大的安慰。本来，蔡元培还期望北京政局有所改观，不料却愈发龌龊，他唯有一走了之。可老老小小远渡重洋，拖累多多，自己身体也今非昔比，若能续聘新妇，再组家庭，那就好得多了。

出国已迫在眉睫，不容再耽搁，于是，蔡元培便乘着夜色，一个人匆匆来沪了。

[二]

一个堂堂的北京大学校长，又已年过半百，为何要举家流寓海外呢？起因便是那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

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英国，为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及北京司法部次长。1922年9月19日，北大一帮学者张罗的“好人政府”登台，黎元洪任总统、王宠惠任国务总理，罗文干出任新内阁的财政总长。然而，尚不到两个月，11月8日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便以“罗擅自与奥国银行签订借款展期合同”为由，逼迫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总理王宠惠抗议无效，只好率全体阁员辞职。所谓“好人内阁”宣布倒台。

随后，由张绍曾组阁，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而罗文干案经过一个月的侦察，认定罪名不能成立，罗文干于1923年1月11日宣布无罪释放。而重聘之阁员，在法律程序上尚须众参两院投票通过，彭允彝为讨好吴景濂等政客以换取选票，居然于1月16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出罗案应交法庭再议，并献策由国务院代表国家为公诉人，申请地方检察厅对罗再行侦察。这样，罗文干出狱后仅5天，又重被收监入狱。

这一来，一向处事谦和的蔡元培大为愤怒，身为教育总长的彭允彝居然“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因罗文干同时是北大讲师（北大规定教授不可兼职，故兼职者皆为讲师），为属下权益计，自己“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①1月17日，蔡元培向总统府递交辞呈，离京赴津。



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本来，蔡元培并没打算离京。事发当天，北大新闻研究所讲师、《京报》主笔邵飘萍就将消息透露给胡适。此后，两人即约蔡元培、蒋梦麟、汤尔和等人餐聚议事。蔡当即表示不愿在彭允彝手下办教育，就由邵飘萍和胡适拟具了辞呈。大家初议，蔡不出京，但汤尔和却认

为蔡应即日出京，因后事难料，蔡元培便依言而行。不料还真被汤尔和言中，接下来，虽然北大和北京国立各校发起了“驱彭运动”，并前往参议院及教育部请愿，可是，1月24日参议院仍然投票通过彭允彝任教育总长。这样，蔡元培就回不了北京了。正好，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弟黄世晖、黄干臣之子纪霆、纪兴皆有出国求学的打算，家人便来津合计，决定由蔡元培亲自带子女及内侄出国留学。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彭允彝的表演尽管很拙劣，但是何至于引起蔡元培、胡适、蒋梦麟这些北京大学核心人物如此强烈的对立呢？这里有更深层的原因。事情要回溯到1922年5月11日的夜晚。

这天晚上，胡适熬了大半个通宵，做了一篇《我们的主张》政论文章，本来是给《努力周报》的，又一想，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就半夜打电话同李大钊（兼校长秘书）商议，定次日在蔡先生家开会，并邀几个“好人”加入。^②

这个“主张”，把建立一个公认的“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包括财政公开）”、“有计划的政府”。同时，提出对政治问题的“意见”，即南北议和、召开和会；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

^① 天津《益世报》，1923年1月20日。

^② 见《胡适的日记》，第35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国会；裁兵裁官，直接选举，严定选举法律；会计公开，统筹国家支出。这个宣言上的共同署名者，除蔡元培、胡适外，还有北京大学教员王宠惠、罗文干、张慰慈、高一涵、梁漱溟，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和政法经济科主任陶行知、王伯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哲学系主任陶孟和、教授朱经农、徐宝璜，美国新银行团秘书王征，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等。

胡适此举并非突发奇想，也不是刻意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开出的一副改良社会的药方，而是出于对长期战乱的痛恨和厌倦，期望早日结束南北两个政府并存所造成的混乱、衰败和分裂的局面。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予袁世凯，并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维护“共和”政体。为通过议会组阁，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民国元年（1900年）12月至民国二年（1901年）2月的选举中，国民党占绝对多数（众议院596席，国民党占269席，参议院占274席，国民党占123席），由国民党组阁已成定局。不料，宋教仁却被国务总理赵秉钧（袁世凯亲信）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孙中山遂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失败后国民党被取缔。后袁世凯称帝不久便病毙，袁之第一重将段祺瑞（淮军皖系）拥副总统黎元洪为总统，黎则任段为国务总理，明令恢复《约法》，重集国会。哪知，旧派武人张勋导演了一场“复辟”皇室的丑剧，《约法》和国会再度被中断。孙中山遂提出护法，1917年7月，在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支持下，孙中山南下广州，许多议员也跟随而来（一百三十余位），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而北方，段祺瑞赶走张勋，又拥冯国璋为代总统，南北遂有两个政府。殊不知，“护法”的西南各省，比北方还要混乱。湘、川两省陷入内战，粤、桂则被“两广王”陆荣廷把持，军政府艰难支撑一年，孙中山便黯然通电辞职返沪。

此后，南方护法军政府改组，选出岑春煊为主席。而北方，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系”国会，也于1918年10月10日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以第一个由文人担任总统的“文治政府”，被诸多中外人士看好。11月16日，徐世昌颁令停止向南军进攻。22日，岑春煊也下令与北军休战。南北议和开场。1920年10月24日，岑春煊、陆荣廷等联名通电，宣布撤销军政府，西南各省统一于“合法政府”之下。徐世昌宣布南北实现和平统一。

而此时，陆荣廷的桂系已被孙中山扶植的陈炯明的粤军及唐继尧的滇军击败。孙中山等在上海发表通电，否认军政府取消。随后，陈炯明邀孙中山返广州，

军政府恢复行使职权，并于1921年4月6日召开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和平统一”，转瞬即逝。

接着，北方政局又起了变化。曹錕、吴佩孚的直系（军人多为直隶省人）及在关外坐大的张作霖的“奉系”（帅府设在奉天，今沈阳），看不得皖系独掌政局，联手打败皖系，入驻北京。可直系又忌奉系向关内扩张，双方又战，奉系兵败退回关内，直系控制了北京。

直系的核心人物，是有“秀才将军”之称的吴佩孚。1919年“五四”运动时，吴通电支持学生；1921年，吴又通电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1922年，他所管辖的京汉、京绥、京奉、津浦、正太五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会组织。因此，此公不仅颇得北京知识界好感，连苏联派往远东的代表马林，也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况且，徐世昌是“安福系”国会所选，有“伪廷”之嫌。所以，直系迎来了重组新政府的良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向关心政治的丁文江，鼓励胡适等人于1922年5月7日创办了《努力周报》（直系战争刚结束），蔡元培也名列发起人之中。接着，胡适就起草了这样一份宣言式的文稿，代表了知识界和民众的普遍心声。

果然，由蔡元培领衔的这份宣言，5月14日在《努力周报》及5月15日在《北京晨报》发表后，直系首领吴佩孚、孙传芳立即连续发表通电响应，重组一个“好政府”，顿时成为改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政治焦点。

那么，如何重组这样一个政府呢？首先是总统人选，就“合法性”而言，非黎元洪莫属。黎本是南方革命党，由南北双方共同协商推举的首任副总统，并合法地继任总统，因张勋复辟而去职，让他复职，南北都能接受。但是，若北方设一个“好政府”，南方有一个军政府，仍不能解决和平统一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由黎元洪组成一个过渡政府，再敦请孙中山辞职，南北恢复国会，重新选举国家元首和内阁，真正实现民主共和。

那么，谁来领这个头呢？当然还是蔡元培。但这却给蔡元培出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难题。因为，蔡元培与胡适等人不同，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的重要成员，曾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并代表同盟会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他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同样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与肯定。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重新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蔡元培又成为北京少数几名党员之一。现在，却要蔡元培率众劝本党的领袖“下野”，重新与北洋军阀政权

“协商合作”，这无疑要背负很大的政治风险。

这时，蔡元培显现了书生的耿介。6月2日晚上，张耀曾（众议院议员、北大法科教授）邀蔡元培、胡适、王宠惠、林长民、罗文干、张公权等人吃饭。席上，蔡元培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人士同发一电，劝孙中山将护法的事作一结束，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席上诸人因往日党派关系，多怕列名。胡适也劝蔡先生以个人名义拟稿，邀李石曾、张竞生（两人亦为国民党员）等列名，以友谊相劝。蔡元培却说：“今天本是石曾、竞生发起此议，他明日即发电去。”^①

第二天下午2时，北京教育界即在国立美术学校聚会，各校教职员到会者二百余人，由蔡元培领衔发表“致孙中山电”，希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指徐世昌）同时下野”。此即著名的“江（3日）电”。之后，徐世昌辞职，黎元洪上台，王宠惠（任国务总理）组阁，阁员为：罗文干（财政总长）、汤尔和（教育总长）、高恩洪（交通总长）、孙丹林（内务总长）、张绍曾（陆军总长）、顾维钧（外交总长）、李鼎新（海军总长）、高凌蔚（农商总长）、徐谦（司法总长）。其中，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重要角色皆系“好政府”主张之签名者，故被称之为“好人内阁”。

可是，“好人内阁”开张后，蔡元培却承受着来自南方的强烈声讨，不仅说他“身事伪廷”，“趋附权势”，“淆国人之视听，乱天下之是非”，还将他直接指为南方的“李用完”（李为将韩国出卖给日本的当朝宰相）。^②

蔡元培个人受到指责辱骂也就罢了，可谁曾想到，曹锟暗中却想自己当总统，所以仅过两个月，便指使吴景濂、张伯烈等政客发难，逼宫之下，黎元洪不敢得罪，居然就签署了无端逮捕阁员手令，致使“好人内阁”倒台。更有甚者，彭允彝竟然落井下石，又上演了更卑劣的政坛丑剧。面对这样的政治闹剧和骗局，一切良好的愿望都被击得粉碎，蔡元培也只有以辞职来抗议，来维护政治道义与个人尊严。

因此，这次他再次离土去国，确实是感到累了，确实是想避开纷攘的政治利害，求得解脱，回到宁静的学斋中去。所以，他要尽快打理好个人的事情，以举家上路。

① 见《胡适的日记》，第367页。

② 《章太炎、张继致蔡元培电》，载《蔡元培书信集》（上），第57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